



【四季零墨】

以身为钥

□张永军

每个人都是一把钥匙，去打开各自人生的锁。

钥匙是唯一的，锁也是唯一的，每个人都有一把只有自己能打开的锁。这并非简单的隐喻，而是对生命存在最本质的摹写：我们被抛入世界之时，便携带了那个确认自身、完成自身的密码；而世界为我们预设的那把锁，则安静地存在于时间的甬道深处，等待一次命中注定的开启。存在的尊严与困境，皆系于这把钥匙能否在漫长的跋涉后，探入那唯一的锁孔，完成那声轻微的却足以震动灵魂的开启。

钥匙的材质生而不同，是人生无可选择的最初境遇。古希腊哲人赫拉克利特说：“一个人的性格就是他的守护神。”这性格的雏形，如同钥匙铸造时融入的金属成分，早已决定了它未来的硬度、韧性，以及可能绽放的光泽。然而，材质并非命运。一把因保养不善而锈蚀破损的金钥匙，其功用可能不及一把被岁月与手掌打磨得锃亮的铁钥匙。钥匙的真正价值，不在于它被铸造时的光芒，而在于它能否在寻找锁孔的长途奔袭中，保持齿牙的锋利与身姿的挺直，更在于它最终开启的那片天地，究竟蕴藏着怎样的风景。材质是起点，是资本，也可能是负累；而最终的定义，永远在于“开启”这个动作本身。

人生的核心课题，其实是一场以身为钥、寻找锁孔的漫长之旅。锁的方位没有地图标示，锁孔的形制也无从预习。我们只能在广阔的尘世与幽微的内心，进行一场接一场的试探与叩问。每一次职业的投入，每一次爱恋的投入，每一次知识的求索，乃至每一次困境中的坚守或转向，都是我们将自身这柄钥匙，探向一个可能的锁孔的尝试。苏格拉底终其一生在雅典的街市与人辩难，他以“认识你自己”为钥匙，不懈地叩问着“何谓正义”“何谓美德”这些人类存

在的根本之锁，即便最终饮下毒芹，其钥匙在锁孔前的坚持，已然为西方哲学开启了理性思辨的永恒之门。东晋的陶渊明，也曾将他的钥匙——那份“猛志逸四海”的才情——反复探向仕途的锁孔，但“性本爱丘山”的质地与官场的锁孔格格不入，直到他毅然转身，“归去来兮”，才在“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”的田园静谧中，听见了内心那把锁清脆的开启之声。

寻觅的过程，即是钥匙自我确认、自我打磨的过程。那些失败的尝试，并非徒劳，它们如锉刀般修正着钥匙的齿纹，使之愈发清晰、愈发独特，也愈发接近那唯一正确的形态。

而人生之锁的“唯一性”，往往并非一个现成的、静候在那里的保险箱。很大程度上，它是由钥匙在寻找过程中，参与共同锻造的。我们并非仅仅在寻找一个预设的命运终点，更是在用每一次选择、每一次行动，塑造着那把最终将要被打开的锁的复杂内部结构。这把“锁”，并非全然外在于我们；它由我们的渴望、我们的痛苦、我们的创造、我们的爱恨交织而成。梵高用他燃烧般的黄色与漩涡般的笔触作为钥匙，他叩击的，并非一个已然存在的、名为“后印象派大师”的锁孔，而是用他全部的生命激情，在艺术与癫狂的边界上，硬生生地锻造出了一把前所未有的、只属于他的锁——那是对色彩的全新诠释，是对情感最直接、最痛苦的表达。他打开了它，同时也改变了艺术世界的锁具图谱。因此，寻觅与创造，实为一体两面。我们既是寻锁者，在某种程度上，也是自身命运之锁的铸匠。

由此，我们得以更深刻地审视那些似乎未曾“打开”辉煌之门的人生。若最终未见门户洞开，是否意味着钥匙的无价值，抑或人生的虚度？绝非如此。钥匙的意义，不仅在于成功开启，更在于它作为“唯一者”的存在本身，以及它在巨大锁具系统

中所处的独特位置。孔子周游列国，其政治理想在当时多数国君的锁孔前无法转动，“惶惶如丧家之犬”，看似失败。然而，他那把“仁”与“礼”的钥匙，却为后世开启了伦理与文明的精神世界。那些无名的工匠、戍卒、农夫、思索者，他们的生命钥匙或许未曾刻录于史册，但正是这无数看似微末的“唯一性”的汇聚、碰撞、承托，共同构成了人类历史这部庞大、复杂、不断被试图破解又不断生成新锁的永恒之书。每一把钥匙，无论其材质、际遇与最终声响如何，都是这宏伟结构中不可或缺的一枚独特齿纹。

人是一把钥匙，人生是一把锁。这一隐喻赋予我们的不是对成败的执着，亦非对先天差异的怨艾，而是一种沉静而勇毅的生命态度。它首先告诫我们承认并珍视自身的“唯一性”——你的悲喜、你的视角、你的生命体验，因其不可复制而具有的底色。它继而催促我们投入那场勇敢的寻觅，用学习、实践、爱与痛苦去打磨自身，保持钥匙的敏锐与光泽。最重要的，它让我们在无论际遇顺逆时，都能持守一份深刻的庄严：即便我只是一块路石，那也应当是一块形态独特、搁置在关键位置的路石；即便我的开启之声微弱不闻，那也曾是一枚钥匙，以全部的生命，诚挚地探问过属于它的那个锁孔。

我们都是宇宙作坊里的一把钥匙，被赋予寻找与开启的天职。那把锁，或许在事业的峰巅，在灵魂的深处，在一段至死不渝的关系里，或在求真理与美追寻的路上。生命的意义，就在于将这柄唯一的钥匙，浸透时光的汗水与思考的刻痕，然后，带着盼望与坦然，向那无形的、却必然存在的锁孔，坚定地探入并奋力旋转——去聆听那或许壮阔或许微渺，但绝对属于自己的开启之音。而这，便是“生而为钥”的宿命与荣光。

（作者为中国作协会员）

□张忠报

【非虚构写作】

在我们老家，村东有条以县城命名的河流。据老人们讲，那是上世纪六十年代，县里组织五个乡镇“出河工”整治的一条河——把原有的一些河沟进行改造，形成贯通南北的一条大河。

所谓出河工，就是动员村民挖河修渠，以工分换取口粮。按照惯例，出河工时往往分段包干，每个乡村一段。那时没有机械，全靠人拿着洋镐、铁锹挖掘。这条河的河床有十几米宽、三米多深，挖的土以梯形形式接力甩出。两岸的土坝四米多高，相距四十多米，全是用独轮木车推土堆筑的，土坝既高又陡，所以推土时要好几个人连推带拉。那种独轮车在我们当地叫小红车，中心木架上凸，两侧安有箩筐；在缺少运输工具的当时，这种车可装载很多东西，而且卸车方便，可当推土专用车。

十二座石拱桥



这条河呈南北流向，北接县城的老护城河，南通邻县。河道贯通后，既能防洪排涝，又能灌溉农田，极大促进了本地的经济发展。当然，有河就有桥，沿河的石拱桥全是县水利部门修建的。听父亲说，当时他初学石匠，正在水建队干临时工，亲身参与了建桥。从我们村往南有十二座石拱桥，每座桥上凝结着他的汗水。我曾问他：“再往南就到河尽头了吗？”父亲说：“不是，再往南就到邻县的地界了。”

河水贯通后，沿河各村在两岸栽满了白杨树，我出生时，那些白杨树已经有碗口粗了。

因为常听父母讲“出河工”的事，每次经过那条河，我都禁不住观望一下。以我们今天的眼光看来，如果没有机械，要完成如此规模的河道开挖，似乎是不可能的。每当站在桥头，我就仿佛看到当时热火朝天的劳动场面，沿河到处布满了手持洋镐、铁锹的村民，他们或是争先恐后地接力开挖，或是喊着号子推着小红车运土，到处是挥汗如雨的劳动者。

听父亲说，当时没有钢管支撑和模板，建设石拱桥主要靠土模施工。先放线开挖桥基，挖完后砌筑桥基桥墩，砌完桥墩，就在桥墩间做拱形土胎，层层夯实填至拱顶，接着弧形修抹成型，然后在上砌拱圈石。这些石拱桥都是用青石砌筑的，青石是从本县山区运来的，料石则现场加工，拿着大锤、手锤，用整子辅助着加工成料石。在所有料石里面，最难加工的就是拱圈石，普通料石只需凿出一个矩形面，而拱圈石要加工成立方体，至少要开凿五个平面，尺寸要求相对严格，这需要技艺高超的石匠才能完成。

在拱形土模上铺好座浆，就沿着两个桥墩往上砌筑拱圈石。因为整个桥面的荷载都是通过拱圈石下传的，所以砌筑要求也很严格，无论是上下小的楔形缝口，还是石块咬合错位的工艺，都需严格把控。父亲说，等建完那十二座

桥，他也成了一名技术精湛的石匠。

砌筑完拱圈石，再砌筑桥身至桥面。桥面浇筑完砼面层后，就安设桥栏杆，并用片石砌筑桥侧的锥形护坡。当然，砌筑锥形护坡前，还要把桥拱下的土模开挖出去，那些土，也是一铁锹一铁锹挖运出去的。

那些砌在桥上的料石，全都是用杠子抬上去的，先用绳套拴牢，然后用杠子穿过绳套，两人上肩抬起往上走。有一次，在抬一块非常大的料石时，由于用力过猛，父亲感觉头晕眼花，一口鲜血涌出了……后来工长安排他回家休养，但只休息了两天，他就重返了工地。

现在父亲早已故去，而那十二座石拱桥稳固如初，它们依然承载着此岸和彼岸，依然承载着过往的车辆和脚步，依然承载着村庄的未来和希望。桥下的拱孔，仿佛父辈用青石雕琢的眼眸，它们日夜目送着流水，并把最为深沉的祝福，默默传递给在这片土地上辛勤耕耘的人们。

（作者为泰安市作协会员）

非虚构写作投稿邮箱：qjwbxyd@sina.com